

后浪出版公司

中国经济史

钱穆 讲授
叶龙 记录整理

林毅夫
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后浪出版公司

中国经济史

钱穆

讲授

叶龙记录整理

林毅夫
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史/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9

ISBN 978-7-5502-1958-8

I. ①中… II. ①钱… ②叶…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史 IV. ① 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0199 号

© 2013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本书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授权简体版,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史

讲 述: 钱 穆

记录整理: 叶 龙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特约编辑: 张 鹏

责任编辑: 刘 凯

封面设计: DERE/不破

版面设计: 张宝英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50千字 889×1194毫米 1/16 19.5印张 插页4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958-8

定价: 39.80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序 一

中国正在重新崛起为经济大国，而此前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中国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钱穆先生的历史著作流芳已久，但这本专门从经济角度梳理王朝兴衰的讲义，却是靠着弟子的发掘整理才得以重见天日的。

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与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本书重视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潮之间的相互联系，涵盖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水利及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政策、还包括政府还是市场主导的经济思想争论。

钱穆先生一生耕耘讲坛，北大的未名湖就是他所命名。治学中，特别强调对本土文化同情的理解。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其间对历史的反思却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那时的中国大都处于低谷期；而用现在的心态去回顾，应该与之前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序 二

吾友叶龙兄既刊行其《历代人物经济故事》(第一集),复出其所编著之《中国经济史》付梓。是篇原为钱宾四先生50年代于桂林街新亚书院讲授“中国经济史”与“中国社会经济史”之笔记。宾四先生著作等身,其史学造诣,早蜚声海内。方民初更始,西学横流,先生讲学上庠,传统是扬,挽狂澜于既倒,意量亦伟矣。独惜于中国经济史尚付阙如,使向慕先生之史学者,不无怏怏。今叶子汇集所记,编整成书,诚快事也。而先生之讲授该两科也,又不限于经济一隅,触类旁通,实可沟贯先生史学之全体大用焉。愿兹篇传之海内,为先生增一专著也。

胡咏超

1996年夏岁次丙子于香港屯门岭南学院

胡咏超先生于新亚文史系与新亚研究所毕业,获中大硕士学位。曾任教于岭南书院直至岭南大学文史系,自讲师至副教授前后逾30年。

序 三

中国历代从政者，“皆据古鉴今，以立时治”。盖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自古圣贤孜孜不倦，终身治经史者，欲其学有成，致用于当世也。先师钱宾四（穆），终身钻研国学。其门下弟子或时人，得其一言一语，或一字一词者，世世享用不尽。1933年，先师于北大任“中国通史”讲席；1954年及1955年，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开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课程。余生也晚，皆无缘承训。幸其通史有《国史大纲》传世，其经济史则自来未见刊行。叶龙学兄早余从侍先师数载，遂有幸并聆两载之经济社会史课程，并详为笔录。叶兄欲先师之学得以传世，自1991年8月，迄1993年1月，两年半间，精心整理、补释两科经济史讲稿，以流畅易读之文笔书之，逐日刊于《信报》。兹为广流传，汇为一集，名曰《中国经济史》。

是书循中国朝代先后论述。汉迄唐一段，最为详尽，特重吾国财经制度之得失。中国以农立国，故述秦以前经济，标榜周祖后稷，教民耕种；介绍黍、稷、稻、麦、菽、粟诸农作物。继载井田制之争议、兴起、变迁与破坏，与夫税法、工商业、货币、私产及水利。

“中国自秦以来2000年之政治、学术，莫不与其社会形态相协应”。“自秦而下经济地域逐次扩大”。秦汉社会经济，重视土地、农业与农民。至若户口之管理、手工业及水陆交通之发展，亦颇著成效。秦代开国，经济已具规模：建立土地私有制，并重视农业。城市涌现，度量衡统一。货币流通，“工商发展，已有可观”。惜苛捐重役，秦遂以亡。

汉初屡改币制，高祖轻商重农，“轻徭薄赋”。制定役法、算赋、田赋、田租、租税、封君诸制，“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政经稳定。汉武

以后，经济思想发达，晁错、贾谊、董仲舒主张统制经济、限田政策，与司马迁自由个人主义经济思想争议不息。古者煮海为盐，冶铁致富。武帝以盐、铁、酒专卖。行均输、平准之制，富国而不利民。又行鬻爵、告缗、屯田之制，广增国用。币制自乱反正，以“节制资本”。皇室与政府，财政分治。惜用度过大，后宫妃嫔，高俸厚给，又大兴礼乐，营造升平，滥用国库。王莽篡汉，“大事改革，田亩尽归国有”，禁买卖田宅，复井田，更币制。以六筮法制工商；行五均法增赋税。然行之太骤，遂促其亡。光武中兴，土地兼并之风盛，颁度田制以抑豪民，惜不果行，庄园制遂兴，豪户多畜奴婢。仍行田租、鬻爵及盐铁专卖之制。虽军费、官俸、交通、赈灾、水利、教育之费颇巨，然屯田之制，亦著成效，故盐铁专卖，至和帝而止。东汉手工业兴盛，辽东、河西畜牧业亦盛。光武初复五铢钱制，至献帝时更为小钱。此外，两汉黄金存量极丰，植林、丝织、冶铁、造船、陶瓷、酿酒、制糖诸业并盛，其轻徭薄赋，节制资本之功欤？

三国魏晋南北朝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化期。土地制之转变尤甚。屯田自东汉末发展至晋，变成占田与课田。北朝则全力推行屯田与均田。土地而外，庄园、矿冶、铸钱及工商业亦渐上轨道。曹魏屯田，强兵足食；邓艾攻蜀，先灌良田；蜀汉屯田，以攻为守；孙吴屯田，民无饥岁。本书详释晋之户调、品官占田、军屯、赋役、杂税、工业、商业、币制、商税及寺院经济诸项目。南北朝之工业，采矿、铸造、制瓷、纺织，以至盐法亦在讨论之列。又分述宋、齐、梁之赋役，陈之屯田，北齐、北魏、西魏及北周之租调、赋役及均田制，与夫五胡十六国之赋役、冶铁工业；并总论北朝经济制度，优于南朝。

综上所述，为余所理解叶兄编撰、补充先师“中国经济史”等之内容。经济史非余所长，苟有未当，是读之未审，思之不精，非原录之失也。1964年3月、4月及6月，先师先后于香港新亚书院三度演讲“论语新解”，其认同及重视语录式《论语》传世价值可见也。时余虽有幸恭聆“新解”，愧未笔录。叶兄独能笔录、补充并出版先师之“中国经济史”等讲稿。是篇以流畅之语体文写成，深入浅出，士庶可读。若人手执一册，则可

明了中国历代经济制度之得失，择其善者应用于今日之工商社会、金融中心矣。妄申是序，敬祈赐谅。

梁天锡

1996年4月于香港能仁研究所

梁天锡博士于香港珠海书院历史系毕业，新亚研究所获硕士后，返珠海研究所深造，考获台北“教育部”颁授博士学位。曾任珠海书院教授、能仁书院教授兼教务长、文史系主任、文史研究所所长。著述宋史多种，逾 200 万字。

自序

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读于新亚书院时，业师钱穆宾四先生掌管校务之余，每年总会开两三门课。当年我同黄开华兄、张乘风兄、颜锡恭兄等四五位同学来到在九龙桂林街设校的新亚书院就读，就是仰慕这位国学大师的学问。我是浙江人，能完全听懂宾四师的无锡国语。宾四师讲的课程，我都用心地作了笔记。其中“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及“中国通史”等，30多年来，由于宝爱这些学术性的笔记，所以一直还保留着。闲时常有翻阅。

宾四师82岁前视力尚佳的时候，我曾先后从宾四师讲的课程笔记中，前后分十多次将其中摘录出的100多条笔记用航空信寄给宾四师批改，集成相当数量的“讲学粹语”，希望可以出单行本。宾四师总是很热心地将我所整理的改正后寄还。宾四师逝世后，遂把这《讲学粹语》寄给梅新先生在《中央日报·长河》刊出，作为对宾四师的纪念。这一条条的粹语是宾四师平时上课或讲演时偶发的，是他心中所蓄积的，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提及过。

钱师母胡美琦女士在《钱穆先生最后的心声》一文中的“后记”中引述宾四师的话说：“学术思想岂能以文字长短来评价，又岂可求得人人能懂、个个赞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写一本书来说明，他还是不会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话，也可启发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发明，已属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能所及，只有待后来者之继续努力。我自信将来必有知我者，待他来再为我阐发吧！”（见1990年9月26日台北《联合报·联副》“送别一代大师纪念专辑”。）

台北《中央日报》副刊按日刊出宾四师的“讲学粹语”后，读到的

友人见面谈及，反应颇佳。这对好学的后辈们可以增长见识，有所启发。因此引起我整理宾四师所讲的“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念头。宾四师开这门课，上讲堂时携带了笔记卡片，是作了有系统的备课的，有他不少新意在其中的。因此我整理了上古之部的六七篇，每篇1000字左右，寄给《信报》社长林山木先生。林先生除了精研当代中西经济外，对于中国古代经济也是极为重视。我们只要看他在《信报》写的《政经短评》（编者按：该专栏刊至1996年底），常见他引用中国古代典籍中论及经济的警句，来阐述或印证当前的经济现象。林先生很快回信，认为有意在《信报》发表，只要尚未在其他报刊发表过的话。于是在1991年8月14日开始，这个《中国经济史》专栏排日在《信报》经评版刊出。当时《信报》经评版逢星期二至六，每周刊出五天。

刊出最先几篇后，我因在台北度假，断了稿，回港后见到《信报》编辑张曼丽姑娘的来信，谈到“此稿刊出后，各界反应颇佳（按：由于断稿的几天里，有读者催稿），希望陆续赐稿，保持联系”等语。刊出期间，有中学教师的读者来信要求我补寄他漏买的其中某一段《中国经济史》；很多老朋友老同学见面时，其中不少是在中学担任行政或执教文史的，他们提议我将来最好出专书；有一次我去港大冯平山图书馆看书，复印机旁看见一位同学正在影印《信报》的经评版文章，我问他比较喜欢哪些文章，他说，凡是有关中西古今的经济文章，他都收集，心想：这篇中国古典经济史还有青年人青睐，心中颇觉安慰。有一次在台北遇见正在台北政大经研所工作的老校友邓辛未兄，他说他的学术单位中，个人或团体订阅的《信报》就有20多份，也很注意我的专栏。最近自温哥华回港的黎国豪兄，他说温市也出版《信报》，很高兴读到我的专栏。有一次遇见饶师宗颐选堂先生，他也看到我在《信报》的这个专栏，要我结集出版时送他一本。饶师曾考评我的香港大学博士论文《桐城派文学史》，评道：“论方苞、姚鼐文论要点出于戴名世，具见读戴氏书，用心细而能深入。纠正时贤浅稚之论，尤有裨于学术界。”选堂师对我的鼓励，使我衷心感激。

还有一位香港企业家维多利亚洋行东主徐家案先生，曾多次来信询

问我何时出版专书，亟欲斥资购买。直至刊完全文后的一年多后，徐先生又来信索书，函中对此文稿多有好评，可说是文教界以外工商企业界的一位知音，我只好影印所剪存的文稿奉赠，作为对知音的答谢。（按：《中国经济史》最后一篇《中国的水利问题》则早于1991年刊登于《信报月刊》8月号。）

值得欣慰的，借着《信报》刊登这个专栏，使我多年未见的老友由《信报》的转信恢复了联系，也因此结识了爱护这个专栏的读者朋友们。

记得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时期，我曾做过几件为宾四师整理讲演稿的事。一件是当时“孟氏教育基金会”（按：此会为今日九龙界限街中山图书馆的创办者）请宾四师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共分八讲，每次两小时。当时新亚书院的秘书徐福均先生要我担任记录。我整理好记录稿誊正后，经宾四师修改润饰，此书出版后，宾四师在该书序中还提及我做记录的事。

另一件是60年代初，我把宾四师从50年代至60年代初历年所作的讲演，包括校庆、毕业典礼、孔圣诞、元旦及国庆等庆典会上所作的讲演，包括由我记录及当时亦常作记录的杨远、宋叙五、王兆麟诸兄所笔录的，刊载在校方刊物上的，有几十篇是我投寄到《华侨日报》教育版或《星岛日报》上刊出的，当时我只作新闻稿报道，并没有具名，也无领取稿费。我搜集了这些宾四师的讲演稿后，请字写得比较端正的多位中学同学誊抄，共有三百多张原稿纸，装订成厚厚的两大本，我自己题了封面写了序，记得宾四师那时住在钻石山的西南台，我将这册唯一的誊正讲演抄本送给宾四师看时，他翻阅目录后，也看了那篇序，然后说：“你这篇序倒写得比前好。”接着他捧着这稿本进他的书房中去了，宾四师那喜悦的神色，似乎肯定了我的这一整理工作，心中颇为高兴。

大概在70年代或稍后，宾四师定居台北素书楼时期出版了一本新亚书院时期的演讲集，书名是《新亚遗铎》，我早年送给宾四师那本手抄讲演集，其中有几篇宾四师的讲演稿都是我自发自动作了笔记投寄到报社发表的，并无其他的校方记录。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真太鲁莽，那些发出去的讲演稿事先竟没有让宾四师过目，不然，他一定乐意为我修改

才寄出的，幸而当时没有出什么乱子，但总是一个过失。

宾四师还有多次为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主办的学术讲座作专题讲演。一次是1961年10月7日讲“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另一回是1961年11月8日起，每周一次，宾四师主讲四次，共计五讲，（第四、五讲一次讲完），讲题为“魏晋南北朝文化讲座”。

以上讲座，均由我随往记录。我将记录稿誊正后呈师改削增删，最后一讲宾四师另行加写五页原稿纸加入，其中一页一字不改外，其他四页亦多增添改削，此稿我仍保留，弥足珍贵。但不知讲稿有否出版，实乃值得出一专书。宾四师撰著发表他的学术思想向来是极为谨慎的。这从我替他老人家记录“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其他的多次讲演，整理誊正后请他修改时，他总是极为仔细地作了修改，甚至我寄给他的“讲学粹语”，他也仔细地改正，有时甚至整条删去，一字不改整条保留的亦只有25条，只增减一二字的亦有多条。

整理学者的讲稿，其困难处比翻译他人著作有过之而无不及，要笔记得完全正确固然难，要做到信、达、雅这三个标准则难上加难了。

此书之能结集出版，首先要感谢《信报》社长林山木先生，能让我在1991年的8月直至1993年的1月，接近两年在《信报》的经济评论版上刊载完毕，也感谢《信报》总编辑沈鉴治先生及经评版的编辑先生与排印校对诸同寅；也感谢壹出版的周淑屏小姐及该社诸同寅，使此书得以顺利出版，尚祈读者诸君惠赐宝贵意见，不吝指正。

叶龙

新版自序

人生的际遇十分奇妙。都是新亚毕业逾40年素未谋面的老校友，本来肯定是我有生之年也没机会相识的了。有历史系的，有英文系或其他系的。我是哲教系又是研究所毕业的，1967年在历史系重读学位。夏仁山学长是重读中文系学位的。自1961年起我与王兆麟兄同时在中文系任教大一国文的兼任讲师，不料在1968年遭遇被裁员的噩运。此后兆麟兄得到钱师母胡美琦女士的推荐去了圣保罗中学，我则在新亚附近的圣母院书院任教。每天下午四时放学，便匆忙赶到新亚上课，选修了全汉升、李定一、陈荆和、刘伟民等名师的课程。由于时间紧迫，根本没法与同学们倾谈。所以当时同读历史系的陆、黄诸兄，压根儿无法认识。

直到41年后的2010年，意想不到的奇遇发生了。接到我曾担任文学审评员多年的艺术发展局邀请参加酒会，并允许可偕同一位亲友参加。仁山兄欣然同往。在酒会中他认识的新朋旧友极多，因此使我认识了历史系的黄浩潮师兄。次年艺发局又来函邀请，仁山兄亦有同往，因此又认识了叶永生和陆国燊师兄。黄、叶两兄多年前已从政府教育、司法机构高职退休，至今仍为香港社会作着贡献；陆兄则自中大出版社退任后，复受陈万雄先生礼聘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总经理。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在酒会中有仁山兄介绍相识，即使在酒会中与上述诸师兄擦身而过，还是不会相识的。

这个世界上，老师中有良师，朋友中有益友，任何人必定在一生中可以遇到几位良师益友的。60年来，自我完成新亚哲学教育系学业以来，不包括中大、港大，我在新亚已遇到很多良师益友。良师中使我最钦佩最敬仰的其中一位，便是钱穆宾四师。当年（1953年）我与李杜、张乘风、

颜锡恭、吴业昭等毕业于协同圣经学院后，为了要亲炙这位大师而来报考新亚的。同学也有多位益友，可惜多位已经作古，而仁山兄可说直到如今仍是我相知最久的益友。新亚四年大专生活，他带我去涂公遂教授家中玩，一同称呼涂伯伯涂伯母，因他们的长女是我们学姊。涂伯母十分好客，假期常去涂府吃喝玩乐，使我这位独在异乡的异客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

20世纪70年代，仁山兄把我这位连考两年中大教育学院的备取生变成正取入读（因有一正取生弃读让我补上）。近年，仁山兄又使我结识了多位老校友，我曾多次对仁山兄说：“你退休后还这么忙，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现在仁山兄又使我认识了多位鸿儒，当中包括丁新豹教授，真使我有高攀不起之感。

说真的，我们这班老校友都很怀念艰苦创办新亚的钱穆老师，我们在多次茶聚中常常谈起这位终身为中华学术不懈钻研而卓有贡献的一代大儒。可惜在1962年时，在钱师担任院长兼所长及教授达12年后，他老人家竟突然宣布要辞职。后来幸得经济系主任张丕介师的坚决挽留作罢。但到翌年（1963年）时，他坚持辞职，而且不愿以退休名义离校。如果当时有校友们同学们群起挽留他老人家，可能会有转圜余地也说不定。（按：10月5日见到雷竞璇校友在《信报》专栏写的《钱穆在新亚》一文中说：“钱穆信函说‘在新亚真如一大噩梦’，此话极重，也极堪玩味，他说的噩梦是‘新亚’，不是中文大学。……人性中有共患难易共富贵的弱点，钱穆辞职时，和他一起创立新亚以及共事多年的同人没有谁离去。未知是否反映内部不一致……”）

宾四师辞职后，仍居港一段时间，我去拜访他几次，他从不向后辈诉说心事或闲谈他人。某次谈及我本身时，他才讲了几句。后来在台北，何佑森兄向我谈起过。宾四师的好友罗忼烈师在其《缅怀钱穆先生》一文中，也曾谈到一些。但不论如何，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名人学者，其生前的遭遇，多有不如意的。但他们对发扬中国学术文化的卓越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宾四师亦然。宾四师爱护新亚的心也是永恒不变的。宾四师辞职后，南洋各大学争相礼聘他，有聘他任教授或做校长的，他

选了一间任教授的，可惜水土不服，最后于1967年赴台北定居。老友张晓峰先生请他担任文化大学研究所的教授，直至92岁退休，屈指一算，他在文化大学教了25年之久。

如果，钱师留在新亚教下去，一直教到92岁，那我们新亚数以千计的同学都可亲近这位不世出的大师，岂不是新亚校友之福？可能有人会说，钱师在新亚辞职那年已是69岁高龄了，怎么还可以教到92岁？普通一位教授当然年届60或65岁已是退休之年，但大师级的教授是在全世界都备受尊重的。例如我们新亚首届校友余英时教授年逾八旬，至今美国知名大学还仍争相聘请他为讲座教授；又如多间知名大学争着礼聘他担任客座荣誉教授的饶宗颐选堂师，今年年届95高寿，杭州西泠印社还礼聘他为社长。名师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如果钱师80、90岁时还在新亚的话，也可以像台北文大般每周只请他讲学一次也做得到。这对我们新亚今后得以亲近名师的数以千计学弟学妹们，真是何等大的福气。

钱师从来不为自己的名利着想，他曾亲口对我说：“两万港元与一万港元的月薪是没有分别的。”他也从来没有为自己置产，直到他病逝那年，现在仍在台北监狱服刑的陈水扁，当年要钱师迁出素书楼，钱师母为了争口气，在市区买下一间屋，房钱付不起，还是一位书商讲义气，多付出一笔版税才能成交。这是一位出版家告诉我的。

钱师主持新亚校政的十几年里，先是住在九龙桂林街和嘉林边道的学校宿舍，后来租住钻石山的西南台和沙田的和风台，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即使他定居台北以后，文大与故宫博物院给他的研究费每个月都是一万元台币而已。可是钱师牵挂着新亚的心却是永远的。记得钱师自台北来新亚参加35周年校庆，筵席上林院长诚邀他40周年庆时再来。我有幸坐近钱师旁（只隔两个座位），只听钱师低声回应着：“那时我可能不能来了，如果人死后有灵魂的话，我是会回来的。”听了使人心感凄酸，但老师爱新亚之心溢于言表。现在老师已逝，一切希望和想法已成泡影。所幸老师还留下丰硕的宝贵著作，让我们后辈研读学习，老师的学术思想将永垂不朽。钱师在经、史、子、集各方面的宏言侃论和卓越见解，我们后辈当谨记勤习，使中华学术文化日益发扬光大。

过去数月来,与上述诸学兄茶聚中,当我提起想把钱师的“讲学粹语”出版时,学兄们均表赞同。于是浩瀚学兄要我把这些拟出版的资料尽快交给国燊学兄评阅。包括钱师的手札以及讲学粹语和多篇对钱师生平的报道,连我曾在《信报》刊载过的“历代人物经济故事”和钱师讲述的“中国经济史”两个专栏作品也一并送审,国燊学兄又请毛永波先生一起来研商何者可先出版。凭永波先生的卓识和锐利目光,认为多年前友人周淑屏小姐在壹出版刊印的《中国经济史》,已缺售十余年,但该社已不出版学术书籍。因此钱师《中国经济史》之得能重见天日,实在衷心感谢国燊学兄之重视及永波先生之识见。也要感谢编辑经验丰富的张宇程先生。他将钱师讲述的中国经济史,准确编排了朝代,订正了在报章作专栏刊出时的一些疏误,成为一册相当完美的学术与知识兼重的历史书籍。也感谢尚学中心的王龙生兄,为此书影印文稿付出了很多精力。

最后,希望爱护本书的读者不吝提出宝贵的意见。

叶龙

于香港九龙

2012年10月26日

叶龙博士自1953年毕业于协同圣经学院后,以同等学力入读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继而考入新亚研究所,由钱宾四师指导,主修中国哲学,得硕士学位。继而一面教学,一面兼读学位,计获中文大学乙级荣誉学位及教育文凭(均主修中文),后又获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均主修中国文学)。

叶君曾执教于香港大、中、小学各七间。历任教师、讲师、主任、教授及校长,计共45载。所教小学有至正、竹庆、沙螺洞、崇正、新会、信义及圣十架等校;中学有协同、李贤尧、刘金龙、圣母院、岭东、培中及能仁等校,大专有东南、广才、华侨、远东、中大新亚、岭南及能仁(含两研究所)等校。服务较久者计有协同、刘金龙各四年;李贤尧任中文或中史科主任共12年,直至退休;继又受聘任私立能仁书院院长兼文史、哲学两研究所所长达9年。叶君服务于新亚亦为时颇长,计任中文系兼任讲师达7年,并任新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达6年,其间由钱宾四师指导,研究唐宋及桐城古文。

主要著作有《桐城派文学史》《桐城派文学艺术欣赏》《中国古典诗文论集》《孟荀教育思想比较》《孟子思想及其文学研究》《王安石诗研究》《中国历代人物经济故事》及《中国、日本近代史要略》等,以及参加两岸三地国际研讨会论文数十篇。至于钱宾四师《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亦由叶君笔录。



钱穆先生 1956 年出席新亚书院九龙农圃道校舍奠基典礼时在台上致词。



钱穆院长（右）时兼任新亚研究所所长，于 1959 年 7 月向叶龙颁发硕士学位文凭。